

一间教室引起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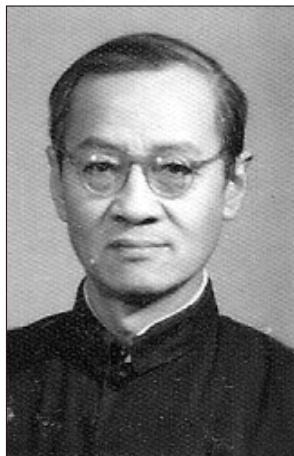
○张世富（1944心理）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南角是我们敬仰的西南联大四烈士墓。在墓园大门的对面有一间西南联大保留至今的教室。每次看到这间教室，总引起我深深的思念。

那还是1939年的事。这一年秋末，我作为联大心理学专业的新生找到了这间教室，这是联大心理系的办公室。教室的一半是一个小教室，另外一半是心理实验室。学生上课和自习，老师自修、实验、开会、办公都在这里。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系主任周先庚教授，而且，从此我在这间教室里度过了7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心理专业与哲学专业合并在一起成为哲学心理系。但是，当时西南联大都习惯地称之为心理系。主要原因是那时心理专业的教师全部为清华大学心理系的，一些教学用的仪器也是辗转数千里从清华大学运来的。

在这间教室里，担任心理专业主要课程的是周先生，他讲授普通心理学、心理学史、工业心理学。此外还主讲心理实验和高级心理实验。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敦福堂教授也讲授心理实验课，对德国的完形学派讲解详尽，对德国的诸多心理学派介绍有独到之处。郑沛留先生主讲动物心理学，他的讲授内容十分丰富，极有启发性，让学生能自然地将心理学的一般规律与人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他对动物的生理解剖尤为擅长。曹日昌先生当时是刚留在系里的青年助教，已在系里开课，这在



周先庚先生

当时的联大称之为教员。他也讲授普通心理学，他的课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对于探讨人的心理极有启发性。当然，给心理系学生上课的还有西南联大的许多老师，这里所说的几位老师都是在这间简陋的教室里上过课的。这间教室的窗子和屋顶四处透风，冬天很冷。于是我们便把教室里的椅子（即火腿椅）搬出来，晒着太阳上课。

解放前，在抗战期间的昆明，物价时时飞涨，生活条件难以使人有最起码的温饱生活。这些老师都过着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苦日子，但他们都认真教学，努力工作并且坚持进修。他们的理论知识基础厚实，博学多才。周先生除了担任系里的工作外，还是任课最多的老师。郑沛留先生于1942年即赴美留学，在动物生理解剖方面很有造诣，解放后已是我国培育优良马品种的出色专家。曹日昌先生于1945年

□ 联大春秋

赴英留学，他在联大时即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在香港大学任教。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从香港回京参加新中国建设工作。在香港时，他动员和组织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返回祖国投入革命工作。曹先生回国后，受党组织的委托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为此，他倾尽全力历经种种困难，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曹先生还编写并出版了《普通心理学》。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心理学专著。在建国初期，这本专著对心理学的学习与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为新中国心理科学研究基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他还组织和聘请了一大批心理学工作者开展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他为新中国心理研究的发展和强大付出了巨大辛劳，功不可没。最令人痛惜的是在“文革”期间，敬爱的曹先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我最思念的周老师在我初进大学时，引导我进入心理科学的大门。在大学毕业时，我考入了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心理学部读研究生，周先生又是我的导师。整整7年，他对我做了无数次指导讲话。在他每次的指导中，都蕴含着智慧、广博的知

识与理论深度，讲到兴奋处，他常常会忘了吃饭。在周先生的引导下，我对心理学从无知到有所认识，之后又指导我在心理科学的广阔天地中进行不懈地探索。

周先生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深造，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专攻实验心理学，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工业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理论知识不仅渊博，而且有其深入的思考和深刻的看法。

周先生一家五口，周师母虽然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但在抗战期间的昆明却找不到工作。周先生家中还有一个患慢性病的孩子，每月需大量的费用为孩子治病和养病。我们可以想象，在极度贫困的旧中国，周先生过的是很贫困的日子。我多次去周先生家，见到全家饭食简单清淡，常年是白菜挂帅。周先生瘦瘦的高个子，脸色又不见红润，嘴唇总略显苍白，显然营养不良。他一年到头穿着从北京带来的灰色西装上衣，冬天穿着灰色带格子的花呢大衣。在昆明期间再没见他穿什么新衣服。由于通货膨胀太猛，他的工资支付全家费用实在困难。周先生教学任务很重，系里的工作繁多，毕业生的论文他要细心详阅并提出意见。我的研究课题和论文都是在他多次指导下才完成的。虽然他身体欠佳，生活劳累，教学与教务工作很繁重，但他每次对我的研究提出指导意见时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就好像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每一次这样的指导谈话后，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感谢他对我不知疲倦地精心指教，让我从中获益。同时又让我深感不安，他的担子如此繁重，还要为我付出那么多的精力。我佩服



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内保留的联大教室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心理实验室，左为周先庚先生

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和敬业的高尚情操。

他爱他的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昆明期间，在他的教育和培养下，曹日昌留学英国，回国后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家治学长从昆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是研究人工智能颇享盛名的专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最早开展研究的知名专家。彭瑞祥学长在心理研究所是研究感知方面有所成就的研究员。同级学友马启伟是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的儿子，他继承父亲的事业，从美国春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体育学院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他潜心研究体育运动心理学，对体育运动心理研究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他也是中国心理学会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林宗基学长在昆明考取留法公费生，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心理学教授。同级学友李宗蕤在上海师范大学主讲儿童文学，他的讲授将心理学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很有造诣。

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对我严格要求，反复教导我要下功夫打基础，他常说这是

清华的精神。这也就是说，基础越坚实，研究才越自如。至今他的话语仍在我的耳际回响：作学问要打好基础，作学问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有了基础，研究才有奔头。我牢记导师的教诲，因此，在近二十多年来，在从事教育心理和跨文化心理的研究中，我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我三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研讨会，一次赴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台湾参加国际心理学研讨会。此外，我还担任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常务理事和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全国社会心理学大会做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专题报告。周先生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十分专注于我的发言。我讲完后，他向我表示祝贺，并且连连点头说：“好！好！可以再做下去。”二十多年来，我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去北大燕东园看望他，每次都长谈到很晚。一次我们的谈话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两点，两人竟忘了吃饭，后来只买到两个麻花充饥。在谈话中，周先生关心我的跨文化心理研究，一再说这项研究很有意义。

我于2002年底终于完成了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个民族的跨文化心理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论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个民族的二十年跨文化心理研究》。这是周先生生前多次鼓励我做的研究项目。论文现已在我国心理学权威性学术刊物《心理学报》发表。

在完成这一课题后，我又一次走过这间教室，周先生讲课的声音、面貌和动作，特别是对我多次孜孜不倦指导的讲话都历历在目，宛如昨天发生的一样。